

讖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

张峰屹

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关联密切的政治文化思想，讖纬思潮流行于两汉时期，对两汉士人和两汉文学都发生了深刻影响。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念的研究视角看，两汉的文学思想与正统经学和讖纬思潮密切相关；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的考量，对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想都不大可能获得准确的认知。从两汉诗赋创作倾向和文学观念两个层面，揭示讖纬思潮与汉代文学思想的联系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关键词 讖纬；汉赋；汉诗；汉代文学思想

何为讖纬，不能简单笼统地去认知，在汉代，讖、纬的概念（称谓）既各有所指、义界分明，又在思想实践中有分有合、纠结缠夹，并且呈现为动态演变的状态。先秦时期早已有“讖”，但没有“纬”（“纬”与“经”相对而称，没有“经”就无所谓“纬”），那时并不存在讖、纬合一还是两分的问题。到西汉初期，“讖”仍延续，同时也出现了所谓“纬”的思想实践——以讖“纬”经（而“纬”这个名称到东汉后期始见，“讖纬”这个名称更晚至三国时才出现），也即以讖释经、以讖辅经，这是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的一种思想新变。两汉400余年间，经讖交织、以讖释经逐渐成为思想常态。以讖“纬”经的思想实践形诸文字，便是所谓“纬书”。因此，概念上与“经”相对的“纬”，其实质就是“讖”；只是由于它的思想路径是以讖释经或辅经，把讖记、讖言、图讖、符命等与经文牵合在了一起，因而称为“纬”，从而也就与单纯孤立的“讖”有了性质上的区别。汉初兴起的以讖释经的思想路径，到西汉后期渐盛，到东汉明帝、章帝时期，遂以白虎观经学会议所形成的《白虎通》为标志，被正式确立为汉家的正统思想。与此同时，无论先秦的“讖”还是汉代的“讖纬”，它们得以形成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之充要条件，是与政治深切关联的。汉代讖纬，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，这也正是其生命力所在。

要之，从学理上言，讖纬的思想特征是以讖“纬”经；从性质而言，讖纬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政治文化

思潮。因此，要想准确把握什么是讖纬，必要抓住以讖“纬”经这个思想路径，以及以讖涉政这个思想诉求，合此二者作为讖纬的判断标准，方能得其枢纽，亦可避免对讖纬的或模糊或泛化的认知。只要把握住上述判断讖纬的标准，就可以对其做根本上的区分^[1]。

讖纬究竟起源于何时？东汉以来歧说纷纭^[2]。实际上，讖纬起源问题与对讖纬的区分紧密相连。既然以讖“纬”经的思想路径和以讖涉政的思想旨趣，是判断讖纬的根本标准，那么单纯的预言、讖记等就不能认作讖纬（它们只是讖）。只有当这些预言、讖记等与经学、与政治纠缠在一起，它们才是讖纬。就学理而言，讖纬的起源必当在经学发生之后（最早也当与经学同时发生），这是自然而必然的认知。根据现存史料，讖纬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。也就是说，伴随着经学的逐步确立，“讖”就开始与经学联姻并干预政治了^[3]。

讖纬在汉代的发展演进轨迹如何？它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从这两个问题出发，我们可以将两汉讖纬思潮之演进分为3个时期：汉初至哀帝时期；王莽（含平帝）、刘秀时期；明帝、章帝至汉末时期。哀帝之前，讖纬思潮基本与政权对立，更多具有讽谏精神，此时的讖纬学者或不被重视，或遭罢黜、入狱，甚至杀戮。王莽、刘秀时期，讖纬被政权充分利用，其主流转而论证现政权的合理性。此时的讖纬学者，如能迎合政治诉求，往往得以拜官封爵；偶有与政权利益冲突者，则会遭受冷

遇甚至惩戒。明帝、章帝之后,经讖牵合互释成为官方正统思想,士人学者往往经讖兼修,成为禄仕常道。综观两汉士人,除极少数外,则无论偏于正统经学的经生,偏于讖纬或方术的方士,无不经讖兼擅^[4]。此种情形,直接影响了两汉文学和文学思想。

一 讖纬思潮与两汉辞赋创作倾向

两汉时期最具文学性的文体,是赋和诗^[5]。哀帝之前的讖纬思潮,其基本特征是与政权对立,往往持政治批判立场。若细加分析,这个时期的讖纬发展又可分为汉初至武帝、昭帝至哀帝两个阶段:武帝之前讖纬思潮虽已兴起,但尚未形成足以引起当权者关注的政治影响,讖纬与士人群体的思想联系也还不普遍;昭帝到哀帝时,讖纬的政治批评精神空前高涨,一些士人开始以讖纬干预政治。

西汉辞赋今存50余篇,都是哀帝及其之前的作品。其中所述讖纬思想与作品主题相关者有11篇^[6],约占1/5。

贾谊的《鵬鸟赋》《旱云赋》、孔臧《鸛赋》,是武帝之前的作品。其中只有《旱云赋》表达的是天人感应的政治观念:“惟昊天之大旱兮,失精和之正理。……何操行之不德兮,政治失中而违节。”应该看到,此赋的政治批判乃是笼罩在贾谊浓郁的个性化抒情述志之中,与昭帝之后赋家的冷静的理性化表述不同。换言之,《旱云赋》以讖纬理念表述的政治批判,乃是附属于情志抒发,并非自觉地借用讖纬观念批评政治。因此章樵题注才说:“贾谊负超世之才,文帝将大用之。乃为大臣绛、灌等所阻,卒弃不用,而世不被其泽。故托旱云以寓其意焉。”^[7]

刘向、王褒、扬雄的8篇赋作,都是昭帝至哀帝时期的作品,大多都体现着明确的或美或刺的政治用意。总的看来,讽谏是主流倾向。《请雨华山赋》,今存文本残缺错讹,但大致内容可解:天气久旱,天子携官员赴华山祭神求雨;天神感动,“天阴且雨”;最后是赞颂天子圣德。《礼记·祭统》有云:“凡治人之道,莫急于礼;礼有五经,莫重于祭。”而雩祭,乃是国家盛典之一^[8]。刘向此赋所表达的,是典重正统的天人感应的政治理念,

同时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中歌颂天子美德。《甘泉宫颂》亦仅存片段,前半部分描摹甘泉宫的巍峨壮丽,后半有云:“窃想圣主之优游,时娱神而款纵。坐凤皇之堂,听和鸾之弄。临麒麟之域,验符瑞之贡。咏中和之歌,读太平之颂。”^[9]明显是以讖纬观念歌颂大汉天子受命于天。而扬雄初入京师两年内所作的《甘泉》《河东》《校猎》《长杨》四赋,据《汉书》本传,都是讽谏之作。其中有大量的讖纬观念表述,限于篇幅,仅各举一例:《甘泉赋》形容甘泉宫“配帝居之县圃兮,象泰一之威神”,又说天子“澄心清魂,储精垂思,感动天地,逆厘三神”;《河东赋》说天子帅群臣赴汾阴祭后土的目的,是“因兹以勒崇垂鸿,发祥隤祉”,其祭祀的结果是“灵祇既乡(向),五位时叙”;《校猎赋》序云:“雄以为:昔在二帝三王……国家殷富,上下交足,故甘露零其庭,醴泉流其唐,凤凰巢其树,黄龙游其沼,麒麟臻其囿,神雀栖其林。”;《长杨赋》云:“于是上帝眷顾高祖,高祖奉命,顺斗极,运天关,横钜海,票昆仑,提剑而叱之。”^[10]或说天子交通天人,感天动地,或说帝王奉承天命,开辟新朝,都是天人交感的讖纬观念。扬雄自如运用讖纬思想观念作赋的目的,是讽谏天子,反映了西汉后期借用讖纬思潮进行政治批判的情况。

王莽(含平帝)、刘秀时期的讖纬思潮,演变为迎合某种政治诉求,直接为政治服务。这个时期的讖纬发展,也可分为两个阶段:王莽擅权至篡代时期,讖纬主潮大抵是为王莽代汉寻找根据,同时也有借图讖反对王莽者,情形比较复杂;刘秀复汉中兴时期,讖纬论说则都是为刘汉复兴提供依据,情形比较单纯——即便有个别批评图讖者(如桓谭、郑兴、尹敏等),也只是在学理上指斥讖纬荒诞不经,并非政治批判。这个时期的辞赋创作存留较少,计有崔篆、冯衍、班彪、杜笃四人的11篇(含残篇)辞赋^[11]。其中述说讖纬思想与作品主题相关者有5篇,即:冯衍《显志赋》、班彪《览海赋》《遊居赋》(一作《冀州赋》)、杜笃《众瑞赋》《论都赋》。

王莽擅权至篡代阶段,讖记、符命不断涌现。但这个阶段竟没有辞赋作品存留下来^[12],今天也就无由考察其时辞赋与讖纬的关系。上述辞赋中《显志赋》比较特别,其“究阴阳之变化兮,昭五德之

精光。……神雀翔于鸿崖兮，玄武潜于婴冥”云云，是借用谶纬的知识和观念，抒发作者“凿岩石而为室兮，托高阳以养仙”的个人情志^[13]，似与当朝政治没有直接关联，但内里涌动的却是冯衍遭受刘秀排挤的政治郁愤^[14]。其他4篇，则都是以谶纬歌颂刘汉中兴：《览海赋》借咏仙来表达，它由观海写到海上神山，再描写帝宫仙境：“曜金璆以为阙，次玉石而为堂。莫芝列于阶路，涌醴渐于中唐。”进而表达作者攀附依托的志愿：“通王谒于紫宫，拜太一而受符。”^[15]东汉初年尚无道教，班彪咏仙无疑是谶纬观念。《遊居赋》有云：“既中流而叹息，美周武之知性。谋人神以动作，享乌、鱼之瑞命。……嘉孝武之乾乾，亲饰躬于伯姬。建封禅于岱宗，瘞玄玉于此丘。”^[16]将汉武帝封禅与周武王“白鱼”“赤乌”的祥瑞征象相提并论，用意显然：以为汉承周德，赞颂刘汉与姬周一样，都是受命于天。《众瑞赋》今仅散存7句，已难见大体。但根据杜笃的生活年代（？—78）和题目透露的信息，可以确定这是一篇描述各种祥瑞征象以歌颂刘秀复汉的作品。至于其《论都赋》，以谶记颂汉的意图就更加鲜明了：“天命有圣，诤之大汉。……乃廓平帝宇，济蒸人于涂炭，成兆庶之亶亶，遂兴复乎大汉。”^[17]

明帝、章帝至汉末时期，谶纬思想与正统经学充分融合，以《白虎通》为标志，从国家层面确立了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纲领，并成为了整个东汉时期的基本思想特征^[18]。明帝以后的士人，谶纬学者、方术士往往凑合正统经典；而多数正统的经学家，以及满富独立批判精神的学人，他们的思想中也无不蕴含着谶验观念。此种情形，也体现在这个时期的辞赋创作之中。

明帝至汉末的辞赋创作，今存约60篇。其中所述谶纬思想与作品主题相关者有19篇^[19]，约占1/3，比例远高于西汉时期。这与东汉时期谶纬地位提高并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系。

“京都赋”之中，傅毅《洛都赋》、崔骃《反都赋》、班固《两都赋》和张衡《二京赋》，影响最大。这4篇作品，都大量涉言谶纬，把京都观念与谶纬述说融合起来，以谶纬颂汉，并表达各自的思想主张。张衡《南都赋》，虽不关涉东西京，也

可纳入“京都赋”系列来看。此作追述刘秀远祖及其来历，以明其为尧后，必承火德而兴；又借《河图》“赤九会昌”之说，歌颂刘秀之兴起南阳。其以谶纬颂汉的旨意，与上述诸赋完全相同。

在歌颂大汉制度中融入谶纬思想，也是明帝之后赋作的一个特征。李尤《辟雍赋》、邓耽《郊祀赋》，即是代表。《辟雍赋》赞誉大汉制度美盛，其中天人感通相应的观念，大抵来自谶纬。《辟雍赋》借用此类谶纬思想，歌颂刘汉王朝的受命于天、制度美盛。邓耽《郊祀赋》，描述大汉郊祀的意义和盛况。郊祀的根本用意，是天子承天以治国^[20]。其基本思想，乃是根基于阴阳天人的谶纬观念。邓赋所谓“含唐孕殷”“承皇极，稽天文”“应符蹈运”云云，即是颂扬刘汉王朝受命于天的符命和德运。此外，崔寔《大赦赋》，虽是歌颂具体的政令措施，亦可置入此类看待。其中“披玄云，照景星”“获嘉禾”“数蓂莢”“拦麒麟之肉角，聆凤凰之和鸣”云云，都是谶纬思想；又其“承天据地、兴设法制”“承前圣之迹”云云，也是基于谶纬的符命观念，歌颂刘汉王朝受天命、承先王、施仁政而得天瑞，与《辟雍赋》《郊祀赋》乃同一机杼。

在描写山川景观、宫室殿堂中融入谶纬观念，是明帝之后赋作的又一个特征。李尤《函谷关赋》、班固《终南山赋》、张衡《温泉赋》和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，是其代表。《函谷关赋》“大汉承敝以建德，革厥旧而运修”，是指刘邦斩白蛇起兵，“五星聚东井”，奉天命而立汉；“天闵群黎，命我圣君”云云，是指刘秀应谶灭王莽、中兴汉室。此赋的核心旨意，是赞美“二祖同勋”，德运悠长。《终南山赋》“唯至德之为美，我皇应福以来臻”云云，直白歌颂东汉“翔凤哀鸣”“珍怪”咸聚的祥瑞图景。《温泉赋》将骊山皇家温泉比作日月出入的瀛洲之“阳谷”、北辰之“营室”，以体现刘汉王朝应合“天地之德”，进而赞美其“洪泽普施”，万方来朝。而《鲁灵光殿赋》更是借铺夸鲁恭王宫殿，从多个角度遍写大汉的福瑞祯祥，全面颂美刘汉王朝“上应星宿”、远绍圣王的德运。

在抒发个人情志的辞赋中，也时常融入谶纬观念。班固《幽通赋》、张衡《应间》、蔡邕《释海》，就是显例。《幽通赋》以恍惚又真实的梦境烘托，

写现实的恍惚和真实，极透彻地表达了人生飘忽、不能自主之感。赋中大量引述前代图谶史迹以抒情达意，把谶纬观念与赋作充分地融会起来。张衡《应间》和蔡邕《释海》，其实都是东方朔《答客难》的翻版，情思并无新意，但是它们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即大量熔铸谶纬的知识和观念：《应间》为说明“人各有能，因艺受任”之情理，以顺天地、理人事而各负其责的风后、重、黎为证；《释海》说君子“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”，也借用了许多天人相感的谶纬知识。

除上述四类外，明帝至汉末其他题材的辞赋，也不乏融会谶纬的情形，如马融《琴赋》、黄香《九宫赋》、王延寿《梦赋》、班昭《大雀赋》等。《琴赋》有云：“昔师旷三奏，而神物下降，玄鹤二八，轩舞于庭。”^[21]用师旷为晋平公鼓琴的天人感应故事，歌咏琴德之诚信重大。《九宫赋》，是今见第一篇描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专赋^[22]。《梦赋》描写作梦中与蛇头四角、鱼首鸟身、三足六眼、龙形似人的各种“鬼神变怪”激战，想象奇谲。篇末有云：“齐桓梦物，而亦以霸。武丁夜感，而得贤佐。周梦九龄，克百庆。晋文盥脑，国以竞。”^[23]用齐桓公北伐孤竹见神、殷武丁梦上帝赐予贤人、周武王梦上帝赐予年寿、晋文公梦楚子咀嚼自己的脑浆的谶验故事，表现作者不惧祸灾的坚强意志。《大雀赋》则是专以述说祥瑞颂汉之作：“嘉大雀之所集，生昆仑之灵丘。……自东西与南北，咸思服而来同。”^[24]

此外，班固的《典引》，历代均不以之为赋。《文选》把它与司马相如《封禅书》、扬雄《剧秦美新》编为一卷，标体为“符命”。其实从汉代的文体类型看，《典引》（以及马、扬二作）实可归入赋体。《典引》专述刘汉的符命、祥瑞和盛德，连篇累牍，堪称刘汉谶记之集成。

二 谶纬思潮与两汉诗歌创作倾向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录西汉“歌诗”28家（类）316篇，惜乎大多已散佚，今天只有极少存留^[25]。当然，这个目录记载的还不是西汉诗歌创作的全部^[26]。迄今辑录两汉诗歌比较完善的，是逯钦

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之《汉诗》12卷。其中的西汉诗歌，共有174首，包括：自刘邦至班婕妤26家诗共49首；杂歌谣辞71首；乐府诗歌（含郊庙歌辞、鼓吹曲辞）54首^[27]。东汉诗歌创作的情况，由于《后汉书》没有目录专志，其数量难以确知。根据《后汉书》诸文人传和《文苑传》，后汉文士大都有诗歌创作，其中有创作很多者，如王逸“作《汉诗》百二十三篇”，应奉“著《感骚》三十篇”，赵岐“作《厄屯歌》二十三章”等。逯书收录的东汉诗歌，共有464首，即：自马援至仲长统32家诗共93首；杂歌谣辞157首；乐府诗歌（含相和歌辞、舞曲歌辞、杂曲歌辞、琴曲歌辞）139首；古诗75首。可以肯定，这个数字仍不是东汉诗歌创作的全部。

据逯书，今存两汉诗歌638首（其中有不少残篇或佚句），这是今天了解两汉诗坛状貌的基本文献。而这600多首诗歌当中，明显涉言谶纬者有100首左右，约占1/6。

西汉时期，明显与谶纬相关的有主名诗和乐府诗，约有50首。

武帝刘彻是这类诗歌创作的大家。今存其《瓠子歌》2首，汉《郊祀歌》十九章中出于武帝之手的《天马》2首、《朝陇首》《景星》《齐房》《象载瑜》，以及其《李夫人歌》《思奉车子侯歌》，都是这类作品。它们或是描述灾异以祈愿，或是抒写祥瑞以颂德，或是在怀人中贯穿天人相感之思绪，体现着浓郁的谶纬观念内涵。《瓠子歌》2首，作于元封二年^[28]。除感慨水患成灾以及凿山填河、伐木塞水之艰难外，还充满天人相感通的祈愿。《天马》2首，《史记·乐书》和《汉书·礼乐志》均有载录，而文字有较大不同^[29]。但是其思想倾向没有变化，都充满了天人通畅祥和的谶纬观念：前一首强调武帝德馨而招致天地祥瑞，后一首突出武帝威德流布而四夷徕归。《朝陇首》1首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称《白麟之歌》：“元狩元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。获白麟，作《白麟之歌》。”《景星》1首，《武帝纪》称《宝鼎之歌》：“（元鼎四年）六月，得宝鼎后土祠旁……作《宝鼎之歌》。”《齐房》1首，《武帝纪》称《芝房之歌》：“（元封二年）六月，诏曰：‘甘泉宫内中产芝，九茎连叶’^[30]。

上帝博临，不异下房，赐朕弘休……’作《芝房之歌》。”《象载瑜》1首，《武帝纪》称《朱雁之歌》：

“（太始三年二月）行幸东海，获赤雁，作《朱雁之歌》。”这4支歌曲，分别歌咏白麟、宝鼎、芝草、朱雁这些祥瑞之物，以自我赞颂德仁政善与天地合德，频获天祐，祝愿王朝昌盛，永被天泽。《李夫人歌》是武帝思念死去的妃子所作，《思奉车子侯歌》是怀念爱将霍去病之子、奉车都尉霍嬭（字子侯）所作。这2支歌曲，抒情真挚浓郁，固无需论；本文的关注点，在于它们的抒情语境：《李夫人歌》的抒情语境是少翁用方术招徕李妃的魂灵，使李妃重现其形象。这个明显的骗局，武帝竟然相信——尽管其怀思情切、关心则乱，但也说明在他的思想观念中，本就相信此类神异之事。《思奉车子侯歌》的抒情语境是霍子侯的升仙：“（奉）车子侯者，扶风人也。汉武帝爱其清静，稍迁其位至侍中。一朝语家云：‘我今补仙官，此春应去，至夏中当暂还，还少时复去。’如其言。武帝思之，乃作歌。”^[31]武帝本极慕仙，此歌既有怀念，又有艳羡，悼人又自悼。西汉时期尚无道教，此类求仙、游仙思想，那时即属于谶纬方术。

今存西汉《黄鹄歌》1首，历来署名昭帝作^[32]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载：“始元元年，黄鹄下太液池，上为歌曰云云。”黄鹄下太液池，是祥瑞重叠之吉兆。《汉书·昭帝纪》颜师古注引臣瓚曰：“时汉用土德，服色尚黄。鹄色皆白，而今更黄，以为土德之瑞，故纪之也。太液池，言承阴阳津液以作池也。”又引如淳曰：“谓之液者，言天地和液之气所为也。”故歌诗赞美“嘉祥”。

西汉自文帝始，即明确地信用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，其后各帝莫不如是。他们或当均有此类诗歌创作，惟不存耳。而西汉臣子的此类诗歌，今存更少，只有韦孟的《讽谏诗》，尚可见谶验观念的影响。据《汉书·韦贤传》，楚王刘戊荒淫无道，韦孟作诗讽谏。这首诗略有刘汉史诗风貌，先是讲由殷、周到秦的世运变迁，再由秦说到大汉顺应天意而兴起，最后是对刘戊的直言讽谏。诗中“悠悠嫚秦，上天不宁。乃眷南顾，授汉于京”^[33]云云，就是歌颂刘汉政权受命于天。

西汉乐府的郊庙歌辞——《安世房中歌》十七

章、《郊祀歌》十九章，今存较为完好。前者是庙乐，传为刘邦唐山夫人所作^[34]；后者为郊乐，是武帝及司马相如等众文士所作^[35]。由于郊庙乐的根本性质就是顺天敬祖以颂德，其中的谶纬观念就表述得更为频繁深透。《安世房中歌》的基本内容是崇孝、颂世，以颂孝为颂汉，为后世树立了庙乐典范。《孝经》载孔子说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是则之。”又说：“生则亲安之，祭则鬼享之，是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”又说：“昔者明王，事父孝，故事天明；事母孝，故事地察。……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亡所不通。”^[36]可见，“孝”的大义，不限于孝顺父母，更在于顺通天、地、人以成就祥和的社会。《安世房中歌》“休德昭清，神来宴娭”“孝奏天仪，若日月光”“冯冯翼翼，承天之则”“承保天休”“嘉承天和”“承帝之明，受帝之光”云云，就都是对大汉孝通天人因而吉祥止止的歌颂。郊祀，是祭祀天地以祈福，所以奉顺天地、赞美天地、描述天人通畅和谐，进而歌颂当世之德运祥和，更是《郊祀歌》题中必有之意。

汉乐府鼓吹曲辞《铙歌》十八曲，也是西汉的作品，但由于文字错乱、增残的情况严重，大多难以读懂。此外，十八曲的内容驳杂不一，文人制作和民歌错杂成编，故典雅与通俗之风调并陈，颇为奇特——萧涤非说，此缘《铙歌》在汉代施用广泛所致^[37]。其中与本文论题相关且可读者，只有《上陵》一首^[38]。据其“甘露初二年，芝生铜池中”句，此歌乃作于宣帝甘露二年。宣帝是西汉继武帝之后又一位好大喜功、粉饰太平且求仙慕道的帝王，所以在他做天子的二十五六年间，各种“祥瑞”不断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载历年神雀、甘露降集及宝鼎、珍兽涌现等祥瑞之事甚夥，其年号“神爵”“五凤”“甘露”“黄龙”，就是发生祥瑞后改元的结果^[39]。这首《上陵》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。其所谓“沧海之雀赤翅鸿，白雁随”“醴泉之水”“芝生铜池”等，显然是对此类“美祥”征象的歌颂。《汉书·郊祀志下》说宣帝“修武帝故事，盛车服，敬齋祠之礼，颇作诗歌”。可以想见，其中必有大量歌唱天人相得、和畅吉祥的内容，可惜今天都看不到了。

东汉时期，所述内容与谶纬相关的有主名诗和乐府诗，今存约20首左右^[40]。

明帝以勤政明察、公正守礼著称于后世，同时，他还特别崇信谶纬——他的诏书多用图谶，《明帝纪》大量记载各种祥瑞，以及他听从曹褒建议，以《尚书璇玑铃》“有帝汉出，德洽作乐，名‘予’”之谶记，改“太乐”为“太予乐”等，都是明证。所以明帝朝的诗歌中存在谶纬观念，就是自然之事。今存东平王刘苍的《武德舞歌诗》、王吉的《射鸟辞》以及白狼王唐菆的《荅都夷歌》三章，便是如此。《东观汉记》卷五《郊祀志》载，永平三年八月丁卯，公卿奏议刘秀庙乐。刘苍建议用《文始》《五行》《武德》之舞，并进献《武德舞歌诗》。这首歌诗的涵义极分明，就是颂扬刘秀受命中兴汉室、天下归服的丰功伟绩，祝愿国运长久。其中“章明图谶，放（仿）唐之文”云云，是说刘汉上承唐尧之德运，受天命而兴盛。王吉的《射鸟辞》、《初学记》卷三〇引《风俗通》和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均载：明帝东巡泰山，到荜阳，有鸟飞鸣乘舆之上。虎贲王吉射中之，并作歌曰：“乌乌哑哑，引弓射左腋。陛下寿万岁，臣为二千石。”明帝遂赐钱200万，并命令在亭壁上画乌。这支歌粗鄙不足道，王吉所以得到厚赏，是因为其中的图谶观念：“乌”在上古是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的征象^[41]，而“日”又是人间君王的征象。王吉射中明帝乘舆上方飞鸣之乌，其谶义是明帝得日、与天合德，是祥瑞的表征^[42]。西南白狼王唐菆的《荅都夷歌》三章，是明帝益州刺史朱辅命掾史田恭翻译之后进献的，文辞典雅，中有“大汉是治，与天意合”，“蛮夷所处，日入之部。慕义向化，归日出主”、“冬多霜雪，夏多和雨。寒温时适，部人多有”云云，歌颂刘汉王朝德合天地、如日之升，且恩泽普施、天地和洽，体现着鲜明的谶纬观念。

明帝时期的此类诗歌，还必须提到班固，其《两都赋》作于明帝时^[43]，后附《明堂》《辟雍》《灵台》《宝鼎》《白雉》五诗，即贯穿着鲜明的谶纬观念：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是上古兼有祭祀、布政、宣教等功能的重要场所，是实现通天得人之政教目的的重要体制，本身即具有浓厚的神道设教意味；宝鼎、白雉，是意义重大的祥瑞器物 and 征象，包含

得天下、得天瑞的天授君权的政治意义。班固歌咏这些制度“美祥”，其颂汉之用意、其深含之谶纬思想，是不言自明的。另据《太平御览》，班固曾作《汉颂》，中有《论功歌诗》。《御览》卷一录载其《嘉禾歌》一首（逯书之题名），卷五七〇录载其《灵芝歌》一首。《嘉禾歌》歌唱春霖适时而降，嘉禾滋长，预兆丰年。颂天即是颂汉——大汉仁德和洽天人，故四时顺行，天祥地瑞。《灵芝歌》专述灵芝之瑞，赞美汉皇德配天地。

班固而外，崔骃《北巡颂》附歌及其《七言诗》，张衡《东巡诰》附歌，都是此类诗作。《北巡颂》有序曰：“元和三年正月^[44]，上既毕郊祀之事，乃东巡狩。……圣泽流浹，黎元被德，众瑞并集。乃作颂。”颂文后半部附歌。张衡《东巡诰》^[45]，有云：“惟二月初吉，帝将狩于岱岳。……是日也，有凤双集于台。……从巡助祭者，兹惟嘉瑞，乃歌曰云云。”由这两段文字，已清晰可见此二诗的谶验内涵。至于崔骃《七言诗》，今存当是残句，其“鸾鸟高翔时来仪，应治归德合望规”云云，歌颂祥瑞之义也甚明显。此外，侯瑾歌诗残句“周公为司马，白鱼入王舟”，也属此类。

东汉乐府也有一些咏唱谶纬内容的歌曲，如《琴曲歌辞》中的《文王受命》、《仪凤歌》、《获麟歌》（此歌原无题，《古诗纪》题此名。以上三歌均见蔡邕《琴操》）、《南风歌》等即是^[46]。《文王受命》，蔡邕《琴操》曰：“受命者，谓文王受天命而王。……乃作风皇之歌。”《仪凤歌》，《琴操》云：“周成王之所作也。……风皇来舞于庭。……于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曰云云。”（《宋书·符瑞志》记载更详）《获麟歌》，《琴操》云：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，孔子泣而作歌。继云：“夫子奉麟之口，须臾吐三卷图：一为赤伏刘季兴为王，二为周灭夫子将终，三为汉制造作《孝经》。”^[47]《南风歌》，《史记·乐书》云：“（舜）歌《南风》之诗而天下治。……夫《南风》之诗者，生长之音也。舜乐好之，乐与天地同意，得万国之心，故天下治也。”^[48]由其题解，已可知这几支歌曲与谶纬的密切关联；再看它们的歌词，吟唱“衔书来游以命昌兮，瞻天案图殷将亡兮”“凤皇翔兮于紫庭，余何德兮以感灵”“麒麟来臻凤凰翔兮，与天

相保永无疆兮”“黄龙负图”“凤凰来仪”，都充满鲜明的讖纬观念。

通过以上简述，大略可见两汉诗歌与讖纬思想观念的紧密关系。而两汉时期的民歌中，也有较多讖纬观念的表述，这更可证明讖纬观念在两汉社会产生了普遍影响，衍及民间文学创作。两汉时期与讖纬观念相关的民间歌谣，今存约20首左右，主要形式是童谣。以下做简单例释：

西汉的歌谣，如：

颍水清，灌氏宁。颍水浊，灌氏族。^[49]

井水溢，灭灶烟，灌玉堂，流金门。^[50]

燕燕尾涎涎，张公子，时相见。木门仓琅根，燕飞来，啄皇孙，皇孙死，燕啄矢。^[51]

邪径败良田，谗口乱善人。桂树华不实，黄爵巢其颠。故为人所羨，今为人所怜。^[52]

出吴门，望缙群。见一蹇人，言欲上天。今天可上，地上安得人？^[53]

谐不谐，在赤眉。得不得，在河北。^[54]

“颍水清”一首，预言灌夫被灭族；“井水溢”一首，预言王莽擅权篡代；“燕燕”一首，预报赵飞燕之祸；“邪径”一首，预示王莽篡汉；“出吴门”一首，预言隗嚣败亡；“谐不谐”一首，预言更始死亡、刘秀兴起。

东汉的歌谣，如：

黄牛白腹，五铢当复。^[55]

直如弦，死道边。曲如钩，反封侯。^[56]

城上乌，尾毕逋。公为吏，子为徒。……梁下有悬鼓，我欲击之丞卿怒。^[57]

白盖小车何延延。河间来合谐，河间来合谐。^[58]

承乐世董逃，游四郭董逃，蒙天恩董逃，带金紫董逃。……出西门董逃，瞻宫殿董逃，望京城董逃，日夜绝董逃，心摧伤董逃。^[59]

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卜，不得生。^[60]

“黄牛白腹”一首，预言公孙述败亡；“直如弦”一首，预言李固暴尸道路而胡广等封侯之事；“城上乌”一首，预言桓灵之际种种政坛状况；“白盖小车”一首，预言桓帝驾崩及朝臣争斗之事；“承乐世”一首，预示董卓跋扈终至逃亡；“千里草”一首，用拆字法预示董卓盛极而衰亡。

综观两汉时期以讖纬为基本内容的诗歌，有帝王文人的作品、乐府诗歌和民间歌谣。前两类诗歌的主题单一，大抵都是歌颂刘汉政权受命于天、德合天地的符瑞祯祥；而民间歌谣，则更多是借用讖纬来表现讽刺的主题，情感真切，与现实的社会人生联系紧密。

三 讖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

今存的讖纬佚文本身，包含着一些可以视为文学思想的材料，涉及文艺思维方式、文艺发生论、功用论以及性情论、地域文艺论等。笔者曾撰《讖纬佚文的文艺观念》一文，做了初步总结^[61]。本文只从文学（文艺）发生论和功用论两个方面，扼要揭示汉代讖纬思潮蕴含的文学观念与两汉文学思想之关联。

关于文学（艺术）的发生，《毛诗大序》和《礼记·乐记》说^[62]：
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……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

《诗大序》和《乐记》都强调“心”（情志）在“物一心一诗（乐）”关系中的中枢作用。同时，它们还注意揭出情志的社会政治（或外物）动因：

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”；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”；“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”“应感起物而动，然后心术形焉”。学者大多把《诗大序》和《乐记》的这个思想总结为“物感说”。笔者则以为，它们固然有人心感于物的说法，但是其思想重点却不在物对心的决定作用，而在强调心的感物作用。《诗大序》在治世、乱世、亡国之音那段话后，紧接着就说：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其思想重点，明显是强调诗歌本身具有的政教和感化作用，特别突出了《诗》本身及其教化功能。因此，《诗大序》才提出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作

诗原则,要求负有政教责任的诗歌本身先须端正。这个意思在《乐记》里表述得更明显:

乐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,其声噍以杀;……其敬心感者,其声直以廉;其爱心感者,其声和以柔。

很明显,《乐记》强调的重点不在说明物动心,而在于说明心感物。音乐的特色和意义主要不是“物”决定的,而是由“心”决定的;“心”通过感物赋予它形式和意涵。因此,《乐记》才只认可先王之乐,而反对其他一切丰富多彩的音乐(不限于郑卫之音)。“郑音好滥淫志,宋音燕女溺志,卫音趋数烦志,齐音敖辟乔志。此四者,皆淫于色而害于德。”^[63]

谶纬讲述文学(艺术)的发生时,也把情志放在了重要地位。如说:

诗者,天地之精,星辰之度,人心之操也。在事为诗,未发为谋,恬澹为心,思虑为志,故诗之为言志也。(《春秋说题辞》)^[64]

诗人感而后思,思而后积,积而后满,满而后作。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,故咏歌之。咏歌之不厌,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(《乐动声仪》)

乐者,和盈于内,动发于外。应其发时,制礼作乐以成之。是故作乐者,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为本。舜之时,民乐其绍尧业,故《韶》者绍也。……文王之时,民乐其兴师征伐,故《武》者伐也。四者,天下所同乐,一也;其所同乐之端,不可一也。(《春秋元命包》)

稽天地之道,合人鬼之情,发于律吕,计于阴阳,挥之天下,注之音韵。(《乐叶图征》)

前两条说诗:《说题辞》讲“诗言志”,《动声仪》讲“思满而作”,从诗之发生角度看,都是一个意思:内心情志发而为咏言就是诗。后两条论乐:《元命包》之“和盈于内,动发于外”、《叶图征》之“合人鬼之情,发于律吕”,也是说内心情志抒发于律吕即为乐。不难见出,谶纬把情志视为诗、乐诞生的渊源之一,或者说,情志是诗、乐产生的直接渊源。

然而,情志又是哪里来的呢?《说题辞》把“人心之操”与“天地之精”并列以释诗,《动声仪》

谓“诗人感而后思”,《元命包》说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乐缘于“民乐”圣王之政,《叶图征》在“人鬼之情”前面冠以“稽天地之道”,它们的共同思想,是情志波动于外感,一言以蔽之,即“感而后思”。但是,如果因此把这个思想概括为“物感说”,是不准确的。因为,完整理解谶纬所述的心物相感关系,尚须看到另一个重要方面:

凡天象之变异,皆本于人事之所感。故逆气成象,而妖星见焉。(《春秋元命包》)

人合天气五行阴阳,极阴反阳,极阳生阴。故应人行以灾不祥,在所以感之,萌应转旋,从逆殊心也。(《春秋感精符》)

阳偏,民怨征也,在所以感之者。(《春秋考异邮》)

非常清楚,所谓“天人感应”,关键实在“人”,“本于人事之所感”“在所以感之者”。人事是因,灾祥是果。谶纬中大量存在的“君王权贵如何则灾祥如何”一类叙说,都是证明。因此,所谓“天人感应”,谶纬实是更多强调“人感天”这个视角,以此作为其参政议政的主要思想和手段。把这个基本思想落实到文艺发生论上,谶纬在论说心物相感问题时,更多强调“以心感物”——这一点,与《毛诗大序》和《礼记·乐记》完全一致。

关于文学(艺术)的功用,汉代文学思想附属于经学,重点强调其政教性质和作用,这一点无需赘言。谶纬在这个方面是怎样认识的呢?其论诗如云:

诗者,持也。以手维持,则承负之义,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。

在于敦厚之教,自持其心。讽刺之道,可以扶持邦家者也。(以上《诗含神雾》)

以《雅》治人,风成于《颂》。(《乐动声仪》)

人主不正,应门失守,故歌《关雎》以感之。(《春秋说题辞》)

玉衡星散为菖蒲。远《雅》《颂》,著倡优,则玉衡不明,菖蒲冠环。

玉衡星散而为鸛,降精为鸡。远《雅》《颂》,著倡优,则雄鸡五足,化而为兔。(以上《春秋运斗枢》)

《含神雾》释诗为“持”，揭櫫其“承负”美刺政教之义。《动声仪》说雅、颂的政治作用，《说题辞》释《关雎》为刺“人主不正”。至于《运斗枢》，则更将种种不可思议的灾异现象，与“远《雅》《颂》，著倡优”的不良政治联系起来，以儆示君王。

讖纬论礼乐，其政教致用的旨趣表现得更加明晰：

文王见礼坏乐崩，道孤无主，故设《礼经》三百、威仪三千。

孔子谓子夏曰：“礼以修外，乐以修内。”（以上《礼稽命征》）

（圣王）制礼作乐者，所以改世俗，致祥风，和雨露，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。圣人作乐，绳以五元，度以五星，碌贞以道德，弹形以绳墨，贤者进，佞人伏。

乐者，移风易俗。（以上《乐动声仪》）

作乐，所以防隆满、节喜盛也。（《乐稽耀嘉》）

先王制乐，所以节百事。（《乐叶图征》）
这些片段，讲的是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和原则，突出礼乐的政教意义。而现实政治的得与失，在音乐中也都可得到反映：

官唱而商和，是谓善，太平之乐。角从官，是谓哀，衰国之乐。羽从官，往而不反，是谓悲，亡国之乐也。（《乐动声仪》）

声放散则政荒：商声欹（倚）散，邪官不理；……羽声倾危，则国不安。（《乐纬》）
而如若王政仁德普施、政通人和、王道太平，则要制礼作乐以颂其成功：

孔子曰：《箫韶》者，舜之遗音也。温润以和，似南风之至。（《乐动声仪》）

周公归政于成王，天下太平，制礼作乐，凤凰翔庭。成王援琴而歌曰：“凤凰翔兮于紫庭，予何德兮以感灵，赖先王兮恩泽臻，于胥乐兮民以宁。”（《尚书中候》）

为什么两汉讖纬思潮会对文学发生如此密切的渗透？一因讖纬本身的性质特征，二因汉代文学的实际地位。汉代讖纬，乃是附属于正统经学的一种政治文化思潮；而汉代的文学及文学思想，同样作为政治、经学的附庸而存在。这就是它们必然相互

融通的人文基础。同时，讖纬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及其想象力本就具有文学艺术特征，以及两汉时期文史哲浑融不分的知识状况等，都是讖纬与文学互渗的重要原因。

〔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东汉文学思想史”（项目编号：14BZW026）的阶段性成果〕

〔1〕以上关于讖纬名义、性征的详细考述，参见张峰屹：《历史维度的缺失——自唐迄今讖纬名义研究之述评》，《文学与文化》2010年第2期；《两汉讖纬考论》，《文史哲》2017年第4期。

〔2〕胪述讖纬起源之观点，姜忠奎分为“以时代为断者”、“以人物为断者”和“以典籍为断者”三类，共罗列了30种说法。《纬史论微》，第18—37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。钟肇鹏，条别为12种。《讖纬论略》，第11—21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。

〔3〕参见张峰屹：《两汉讖纬考论》，《文史哲》2017年第4期。

〔4〕详见张峰屹：《讖纬思潮与两汉士人心态之迁变》，《南开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7年第5期。

〔5〕两汉之文亦不乏情文并美者，但大抵为政论、史著以及论学、书信等应用文体。限于篇幅，暂存而不论。

〔6〕这11篇是：贾谊《鵬鸟赋》《旱云赋》、孔臧《鸛赋》、刘向《请雨华山赋》（残）、王褒《甘泉宫颂》（残）、扬雄《蜀都赋》《甘泉赋》《河东赋》《校猎赋》《长杨赋》《覈灵赋》（残）。

〔7〕以上贾谊《旱云赋》之引文及章樵题注，均见章樵注：《古文苑》卷三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。

〔8〕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（仲夏之月，天子）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，大雩帝，用盛乐。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，以祈谷实。”（孙希旦：《礼记集解》，王星贤等点校，第450页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）

〔9〕〔15〕〔16〕〔21〕〔23〕〔24〕欧阳询：《宋本文类聚》，第1680页，第250—251页，第782—783页，第1201页，第2034页，第236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。

〔10〕按：以上引文均见《汉书·扬雄传》班固撰：《汉书》，颜师古注，第3513—3588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。

〔11〕费振刚等《全汉赋校注》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）、龚克昌等《全汉赋评注》（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）所录相同。唯《校注》将佚名《神鸟傅（赋）》著录

于此时,不妥。此作1993年出土于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,该墓葬有确切的墓主身份和纪年,墓主师饶下葬时间是成帝元延三年(参见《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96年第8期)。故此赋当作于成帝末年或之前。

[12][29][46]参见张峰屹:《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》,第379—380页,第399—401页,第414—416页,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3][14][17][43][53][54][55][56][57][58][59][60]范晔撰:《后汉书》,李贤等注,第987—1001页,第962—1003页,第2596—2608页,第1335页,第531页,第11页,第3281页,第3281页,第3281—3282页,第3282—3284页,第3284页,第3285页,中华书局1965年年点校本。

[18]参见张峰屹:《经讖牵合,以讖释经:东汉经学之思想特征概说》,《文学与文化》2017年第2期。

[19]这19篇是:傅毅《洛都赋》、崔骃《反都赋》、班固《两都赋》《幽通赋》《终南山赋》、班昭《大雀赋》、黄香《九宫赋》、李尤《函谷关赋》《辟雍赋》、张衡《温泉赋》《南都赋》《二京赋》《应间》、马融《琴赋》、邓耽《郊祀赋》、崔寔《大赦赋》、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《梦赋》、蔡邕《释海》。

[20][28][30][32][33][34][35][39][50][51][52]班固撰:《汉书》,颜师古注,第1253—1254页,第193页,第193页,第218页,第3101页,第143页,第1045页,第1248—1253页,第1395页,第1395页,第1396页。

[22]关于《九宫赋》受纬书影响的论说参见龚克昌等:《全汉赋评注》,第347—348页。

[25]如其“高祖歌诗二篇”,当即是今存的《大风歌》《鸿鹄歌》;其“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”之中,或许包括有今存西汉有主名诗。

[26]如今传高祖唐山夫人《安世房中歌》十七章,司马相如等《郊祀歌》十九章,汉《铙歌》十八曲,以及戚夫人《春歌》、赵王刘友《幽歌》、城阳王刘章《耕田歌》、武帝《秋风辞》《瓠子歌》《天马歌》《西极天马歌》、昭帝《黄鹄歌》等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诗歌,似均不在其内。

[27]逯钦立辑校: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下文简称“逯书”。

[31]张君房编:《云笈七签》,李永晟点校,第2404页,中华书局2003年版。

[36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·孝经注疏》,第2549页、第2552页、第2559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[37]参见萧涤非: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,第49—50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

[38]《铙歌》十八曲的某些诗句,也体现着明确的讖纬观念,如“圣人出,阴阳和。……驾六飞龙四时和”(《圣人出》)等,但太过零散,故不赘。

[40]今存内涵与讖纬相关的有主名汉诗(含可知作者的乐府诗),都是西汉宣、元之前和东汉明帝后桓、灵前的作品,未见两汉之际的诗作。就是说,这些诗歌都是两汉讖纬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作品。

[41]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云:“汤谷上有扶木,一日方至,一日方出,皆载于乌。”郭璞注:“(日)中有三足乌。”(袁珂:《山海经校注》,第408—409页,巴蜀书社1993年版。)按: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李贤注引《春秋元命包》曰:“乌者,阳之精。”(范晔撰:《后汉书》,李贤注,第1373页,中华书局1965年年点校本。)

[42]《春秋运斗枢》:“维星得,则日月光,乌三足,礼义循,物类合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〇,第4083页,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。)

[44]按: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《后汉纪》《东观汉记》均谓章帝于元和二年初东巡,盖《文馆词林》刻误。

[45]张震泽校注的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)以为,《东巡诰》作于安帝延光三年。

[47]蔡邕:《琴操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孙星衍辑校本,第153页、第154页、第159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。

[48][49]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,第1235页,第2847页,中华书局1959年年点校本。

[61]参见张峰屹:《讖纬佚文的文艺观念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第6期。

[62]本文引用《毛诗大序》,均据孔颖达撰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,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;引用《乐记》,均据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。下文不再详注。

[63]详见张峰屹:《西汉文学思想史》,第172—175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。

[64]本文引用讖纬佚文,依据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辑《纬书集成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),文中未加详注。需说明者,该书偶有辑录不当、失校,或是排印错误,本文均核校原始出处直接随文修改,亦不一一出注。

[作者单位:南开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:赵培